

提灯大会庆七一

全国港澳研究会创始会长、国务院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当年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他回忆了谈判中最难忘的经历。

要留1000亿家底

1990年的时候，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被提了出来，英方表示，香港回归时，他们留给香港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元。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急了，向英方提出义正词严的交涉，大声呐喊：“50亿，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在经过一系列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艰苦谈判之后，当1991年6月30日我把整理起草的中英谅解备忘录文本摆在英方代表面前时，英方终于同意，把“留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250亿港元”作为坚定目标。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当时我们考虑，中方管理的土地基金可以有约700亿到800亿，如果再加上250亿，那么起码就有1000亿以上的家底，勉强够特区成立时开张，不至于捉襟见肘。

文史杂谈

李世民很爱哭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亲哥哥太子李建成后，先将父亲李渊控制起来，随后又跑到他的面前跪地号哭不止，控告李建成如何如何谋反，自己是万不得已才杀他的。随后，软硬兼施，逼迫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宝座坐稳之后，在给李建成发丧时，李世民再次痛哭流涕。

魏徵是贞观时期第一名臣，他病危和去世时，李世民曾3次痛哭流泪。但不久，听奸人诬告说魏徵拉帮结伙，有谋反之嫌，他便派人将其墓碑推倒砸碎。

尉迟敬德是李世民的爱将，出生入死，战功累累。一天，他问尉迟：有人告你谋反，是怎么回事？尉迟立刻脱下衣服，露出满身伤疤给他看，李世民当即痛哭流泪说：我不怀疑你，才跟你直说的。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自晋阳起兵，中经“玄武门之变”称帝直到伐辽失败病逝，有记载可查的，李世民共哭25起，31回。中国历代400多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乃爱哭之冠。孙国学

英国人的阴谋

临近1997年，英方大幅度提高福利。当时香港GDP年增长率约5%，可是英方悄悄地以每年27%以上的速度提高香港的福利。1995年末，一位港英负责官员终于说，我们已经用了5年时间提高香港的福利，我们还要用5年时间以这种速度发展福利，这样，到2000年香港就会成为世界上福利好的地区。我们中方肯定就不干了，这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另外，福利增长幅度太高，前几年它可以“做好人”，后来接手的特区政府就难当这个家，因为底数越来越大，更何况如果香港经济放缓，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香港特区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够代表香港未来的利益与英方谈判。因此，我当时很着急，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跨九七财政预算案专家小组中方组长，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要为香港多争一些财政储备，留个好一点的家底。用香港同胞的话来说，“我们要看住这个数”。

4575亿港币

由于祖国内地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使得香港在过渡期后半段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动力。所以在香港回归、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中央政府从英方接管的财政储备

是4575亿港币，当即一分不少地全部依法移交给了特区政府。

正因为有了这个家底，在1998年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特区政府才有力量重拳出击，击退国际金融大鳄对香港的冲击。

链接

《香港基本法》起草内情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草稿是争议比较多的一章。有些起草委员以为除国防、外交外，中央对香港的其他事务无管辖权，所以对草稿里把“国家行为”涵盖为“国防、外交等”的这个“等”字大惑不解。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向他们解释，这个“等”就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既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拥有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也都是中央实质性任免的，那么权力属于中央的这些个“等”，不也应该“国家行为”，是中央

应有的权力吗？

起草委员们在大前提上取得了一致，但讨论到具体条款的某提法、某措辞甚至标点符号时仍十分热烈，有的历时几年才得出结论。如第17条关于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最终写成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该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条款，可将其发回。一旦发回立即失效，但无溯及力。“报备和发回立即失效”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立法的审批权，“无溯及力”体现了中央对特区权力的照顾。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该法。

邹衍：放牛娃巧布“火牛阵”

不久前去世的开国少将、原沈阳军区副政委邹衍，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霞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年仅13岁的他就参加了崇贤秘密农民协会，奉命打探消息，传递信件，14岁时当上儿童团的指导员。

1930年，年仅15岁的邹衍跟着赤卫队参与了攻打吉安县城的战斗。然而

吉安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依靠牢固的城防和外围工事，加上精良的武器装备，逼得挥舞大刀的赤卫队无法靠近城防。如何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年仅15岁的邹衍出了个主意：“当年田单打燕国人，摆下了火牛阵，咱们也可以试试啊！”

由于邹衍从小放过牛，对牛的秉性非常熟悉，于是他带领小伙伴们动员乡亲们

把牛都牵出来。牛角上绑着尖刀，尾巴上绑着鞭炮，身上裹着厚厚的稻草，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身冒火焰的火牛冲向敌人，吓得白军魂飞魄散。于是赤卫队顺利占领了敌人的外围工事。后来红四军、红五军到达，顺利攻克吉安城。

于是，“放牛娃巧布火牛阵”的故事在红军队伍中传开了。澎湃

澳大利亚为何愿意当“跟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只剩英国在苦苦支撑，而英国靠的也全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些自治领。

澳大利亚一直跟着英国混，但英国人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向东南亚进军了。日军一口气打到新加坡，澳大利亚急了。新加坡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堡垒，驻扎着十几万英国大军，澳大利亚还把精锐第八师也

派到了新加坡一起防守。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新加坡是坚不可摧的，结果没想到，守卫新加坡的英国贵族指挥官居然没打多长时间就向日军投降了。

经过二战的洗礼，澳大利亚的外交完全转向美国，跟大英帝国说拜拜了。当然了，澳大利亚“无役不予以”的习惯一直保留着，二战之后也是如此。他先是跟着美国去打了朝鲜战争，然后又去打了越南，后来海湾战争他去了，阿富汗战争也去了，伊拉克战争又去了。总之，凡

是美国参与的战争，他都去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虽然没发动过一场战争，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有他的影子，而且表现得特别努力。

澳大利亚的“无役不予以”反映了一个重要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出身低，老想证明自己。他很清楚，在世界舞台上自己只是一个配角。他从来没有演主角的企图，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演员表”里得有我。

可以这么说，澳大利亚的历史就是一部天天跟着出去打仗的战争史。树清

吴海勇

“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38年的5月26日。这一天，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开始对国民党新一轮的诱降政策攻势。在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开始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演讲中提出了全面抗战一周年，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两个纪念日（即7月7日和7月1日）。

事实上，早在毛泽东开始演讲《论持久战》的第9天，陕甘宁边区党委就根据有关讲话重要精神，开会决定当年的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宣传周”。6月15日，《新中华报》报道称，商定自7月1日起至7日止为“纪念周”，并确定7月1日举行延安各界庆贺共产党17周年纪念提灯大会。

1938年7月1日这天，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冀豫根据地等若干敌后根据地纷纷举行各类庆祝活动，而尤以延安的庆典盛况空前。

延安街头，商店、合作社、饭馆等门面粉刷一新，旧标语换上了新标语，墙壁贴出了招贴画《中国像巨人一般站着》，还有敌人巨量损失的统计。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儿童、商人、军人等社会各界纷纷走出屋外，宣传队员在激昂地演讲。

庆祝活动的压轴好戏，当数提灯大会。晚上7时，大会宣布开幕。激越的乐曲响起，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指挥者是鲁迅小学学生于龙江。据参与者回忆，那夜，灯火通明、火炬熊熊，从延安城上望去，仿佛一片星海，各种雄壮的歌声混响在城市的上空。提灯大会正式开始，飞机灯、炸弹灯、高射炮灯、坦克车灯、战舰灯、五星灯、宝塔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五星·斧头·镰刀”灯最引人注目，灯上一面写着“7·1·7·7”，另一面写着“1921—1938”。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的火炬、第四大队的化装游行让人印象深刻。延安警卫部队14位勇士各执一架飞机，举在半空中，组成飞机队，也是格外抢眼。提灯游行持续一个多小时，到当夜9点15分才结束。